

医 史 文 献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医工作史略

李 经 纬

本文所指的革命战争时期，是指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阐述的重点是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怎样调动中医积极性和做好中医工作的。

众所周知，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国民党政府把消灭中医的政策推向顶峰的时期，两个政权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医和中医学术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传统医学与广大中医，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严重摧残，处于被取缔和消灭的境地。然而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医和中医学术则受到尊重，广泛吸收中医参加革命工作，广大中医为革命卫生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下仅就调查研究所获得的历史资料作一初步的记述，希望能引起重视。

一、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医工作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上，历来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政策，既不一概否定，也不全盘肯定，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中医学是应用科学，不是文化艺术，但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国革命对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中医和广大中医在人民保健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数十年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中医政策。

早在国民党政府大唱消灭中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即指令苏区军民“用中西两法治疗”官兵疾病和医治伤病员和俘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军和苏区重视吸收中医参加革命卫生工作，举办中医医院，或中西医结合医院。例如，1927年10月，于井冈山茨坪设立的第一所红军后方医院，共有三位医生，其中两位是中医。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会师，在大井、小井设立的医务所和红军医院，收容参加反围攻战的二百多名伤员，全部应用中医中药治疗。在根据地预防猖獗的疟疾传染，除捕灭蚊虫外，

运用常山、小柴胡汤进行预防和治疗，发挥了良好的作用。1929年5月，工农红军挺进闽西开辟根据地，在上杭创办红色医院时，曾聘请医师六名，其中五名是中医。

设在海南岛石泉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医院，中医运用自采的中草药上山虎、下山虎、接骨草、龙眼核等，使大部分骨折和伤病员经中医中药治疗而康复。

1929年5月，在黄安县刘家花园，主持鄂豫皖苏区第一所红军医院的，是一位中医和只有两年看护经验的“西医”，他们团结合作，共同采集中草药进行医疗救护，在医治伤病员和培养护士方面，不断做出了新的成绩和贡献。

1931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江西瑞金诞生，这是中国革命政权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即现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当时，反“围剿”频繁而残酷，药品供应艰难，学校提倡运用中草药代替西药。例如，用小柴胡汤代替奎宁、阿斯匹林；用饮食疗法、运动疗法等代替药物治疗。1933年，学校设在江西兴国县，发动学生采集中草药和制造中成药等；1934年秋末，红军军医学校随军长征，更是自己动手，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提倡运用中医和民间医疗方法，胜利完成了红军的医疗救护任务。例如在过草地时，学生与病房人员每天早晨都要先采好麻黄、贝母、知母、车前子、大黄、柴胡等，用以治疗部队常见的下肢溃疡、痢疾、疟疾、伤风感冒等，都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湖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创办了黄冈医院，最多时曾收容伤病员达千余人。医院专设有中医科、中药科，有中医主任一人，中医四人，司药、采购及护士数十人，中药科除科长外，还有十人组成的中草药队，专门负责上山采药和配制中成药等。在湘鄂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后方医院，有床位20张，仅有三名医师，均为中医。其外伤处理，除用盐水外，均用中草药，并获得显著效果。

在川陕根据地,1933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立了中医医院,该院共有中医百余人,运用中医中药、针灸等治疗伤病员。这个医院曾动员“医务人员研究中药代替西药”。有百余人专门负责采药、煎药和将中草药加工制成粉末,以便分装携带,适应战争流动性大的需要。在川北通江城,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也组建了一所中医医院,根据中医师之特长,设有内科、外科、妇科等临床科室。重要的是这所医院还举办了中医师训练班和护士训练队。中医师培养除学习《内经》、《伤寒论》、《脉经》、以及本草书籍等之外,主要是以老师带徒弟的传统方式进行实际培养。学生跟随老师看病,老师结合实际病例讲解指导,先后培养中医内科、外科医师等百余名。尽管是中草药,但供应也很紧张,因为,医院每天必须满足千余剂中药处方的需要,所以,每天都派出三十余人外出四处采购,同时还要有五十余人各处去采集。当时自采中药有黄芩、知母、车前子、半夏、木通、桔梗、柴胡、前胡、麦冬、花粉等百余种之多,这所医院在扩大中医中药影响方面作用深广。

1933年,在江西瑞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原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把该院迁到瑞金,正式编为中央红色医院,该院有一位中医,这就是邓颖超同志的母亲。1934年,闽东游击队的医疗,由于敌人重兵“围剿”,供应中断,也是依靠中医中药渡过难关的。随着游击队的发展壮大,部队重视吸收中医参加革命卫生工作。当时在处理伤口上先用浓茶冲洗,然后外敷金黄散,一般情况下,伤口一周内即可愈合。在湘赣边区的红军卫生工作,也十分重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譬如药物来源,除医护人员上山采集外,还有地方将生药、炮炙药物等作为支前的任务,不断送给红色医院。该院治疗疟疾多用小柴胡汤,治疗痢疾多用马兰根制剂等。

综上所述,虽然来自一些有限的调查研究,但可以看出,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医中药在保障战争条件下的伤病员和群众健康上,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动员组织中医举办中医医院,中医训练班培养中医人才的成功经验,更是十分宝贵的。有一点是应该着重强调的,大革命时期动员中医参加革命、办医院、救治伤病员等,绝不仅仅是由于西医药来源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正确估价中医中药的科学性作为思想基础的。中医中药工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给予正确对待中医中药方针政策以新的动力。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成

功。这同国民党政府取缔中国传统医学的政策,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因为,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通过了废止中医的提案,他们用政权规定不许办中医医院、不许办中医教育,甚至不许宣传中医等,他们企图在五十年内完全消灭中医。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革命根据地对中医工作,也并非没有分歧看法,有的人将党的中医政策视为在西医药奇缺情况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在实践中看到中医中药疗效卓著而转变看法。总之,在那些年代里,根据地、苏区和革命军队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的中西医,一般都是彼此尊重,相互团结合作的,对中西医学术也都能相互学习,并建立了战斗友谊,这些经验是十分宝贵的,这也是中医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医工作

红军长征于1935年胜利到达陕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为了迅速改变边区卫生面貌和军民健康状况,从实际出发,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互相学习,为推动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卫生事业而共同努力。

1938~1945年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许多讲话和文章,反复论证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问题,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继承发扬以及相互的辩证关系问题等。批评了全盘否定和肯定一切的错误观点和倾向。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医学方面,毛泽东同志和边区政府也发出了重要的指示。譬如1940年在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周年大会时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第63次会议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中强调: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文教工作大会上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为题,发表演说,进一步号召团结中西医,号召中西医要为改善人民健康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批评那种不关心人民疾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位中医,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为了贯彻会议精神,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富春,先后多次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专门研究了中医工作问题,并正式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方针和要求。在座谈会上,和平医院院长、西医外科兼妇产科专家鲁之俊等,表示要向中医针灸专家任作田老先生学习。一系列的会议和动员,在边区围绕着加强中西医团结合

作, 继承发扬中医学, 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1. 建立中西医研究总会

1945年3月13日, 边区中西医研究总会经一段时间的筹备, 在延安正式成立。成立会由李富春副主席主持, 林伯渠主席致词强调: “为了更好地为边区人民服务, 必须集中中西医及医务各方面力量。……中西医合作之后, 可以交流经验, 使中医的经验与西医的科学方法相结合, 而能创造新的医理和医术”。李富春副主席号召中西医要“打破过去的成见, 亲密团结, 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 实现中医科学化, 西医中国化”。参加大会的中外和中西医专家有毕光斗、傅莱、米勒、何穆、鲁之俊、黄树则、任作田、魏一斋、山田等, 他们在发言中也都强调了研究会成立的重要意义, 并表示一定要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合作。会议一致通过《中西医研究会组织简章》, 并推选李富春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刘景范为副主席, 傅连暲、苏井观、鲁之俊等十三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聘请国际友人傅莱、阿洛夫、米勒、山田、方禹镛为顾问。该会成立后十分活跃, 他们组织中西医医疗队下乡防治流行病; 登记会员, 筹建地方分会、支会; 举办中医训练班培养中医; 召开中西医药学术经验座谈会等等, 对开展中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成立边区保健药社及卫生合作社

1938年在安塞成立的边区保健药社, 曾对发展中医中药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 延安仅有中药店七家, 边区人口150万, 每年死于传染病者却高达八万余人。这种状况引起中央和边区政府极大重视, 为了迅速改变边区落后的卫生状况, 边区政府委托中医李长春(当时任延安市委组织部长)在保健药社的基础上创办总社, 并于1940年在延安正式成立,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健药社暂行章程》同时颁布。该社除经营中西药材、器械外, 还聘请中西医师为群众防治疾病。保健药社在调动中医中药人员积极性, 改变边区卫生面貌和控制传染病流行、降低死亡率、以及加强中医中药研究和培养中医中药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 保健药社的中医集会, 贯彻边区文教会议关于团结中西医精神, 确定“团结和提高边区中西医, 实行中西医合作”为该社的任务。提出: 保健药社的医师不分中西, 破除成见, 团结合作, 互相学习, 交流经验, 公开药方等。他们在合作研究关节炎和改进中药剂型, 发展边区中医中药作出了富有成效的贡献。为中西医研究总会的建立, 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3. 卫生合作社

卫生合作社是1944年延安地区伤寒流行时诞生的。合作社提倡: “中西合作, 人兽并治”。社内既有中西医、中西兽医, 又有中西药房, 进行免费诊病。其资金和药材来自李富春副主席的募捐和各级政府卫生部门的赠送。该社还十分重视民间单验方的收集、研究和推广。

4. 西北制药厂的中药部

为了打破敌人的长期困因, 特别是胡宗南的严密封锁, 于1938年初即筹建西北制药厂, 经费来自宋庆龄的捐助。该厂中药部的原料除采购、以物交换外, 主要还依靠组织人力四处自采, 如边区盛产的麻黄、黄芩、知母、苣荬、甘草、当归、桔梗、柴胡等数十种常用中药, 经加工制成“热退尽”、“汗必灵”、“利痰尽”、“敌痢散”、“涤肠灵”、“壮而神”、“黑色补丸”、“经便通”、“红色幸福膏油”等成药, 每月产量达二百多公斤, 深受医患的欢迎。该厂的中药有效成分提取, 如麻黄素, 黄芩碱甲、乙, 当归油、糖, 以及生产陈皮酊、桂皮酊等, 都做出了显著成绩。1940年总结经验时, 编成《抗战新药集》, 朱德题词指出: “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最有前途的”。徐特立题词: “用科学方法改进中药, 吸收中医的经验”。饶正锡序言强调: “批判地对我国有悠久历史的国产药材选择利用, 用科学方法提高中药的地位”。这个厂对中成药的生产和有效成分提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粉碎敌人封锁创造了有利条件。

5. 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

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中西医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后, 鲁之俊院长即到延安著名中医针灸医师任作田家去学习针灸, 同时跟随任老临诊, 经过数月的刻苦学习, 基本掌握了针灸的原理和常见病的针灸疗法, 并回到和平医院开始进行针灸治疗和研究。此时, 朱琏同志也参加了针灸学习和研究。经过三个月的临床观察, 于1945年7月19日在《解放日报》以《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为题, 作了专门报道。同时, 报社以《从研究针灸说起》为题, 发表了署名评论。指出西医学习中医“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并“要求西医今后更多的研究中医治疗经验”, “希望中医也要迎头赶上”为进一步贯彻文教会议精神, 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 发挥中医作用, 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6. 晋察冀等之制药厂

随着部队和根据地中医中药工作的推进, 中药需求量也不断增长。1939年下半年, 晋察冀军区决定创办制药厂, 并于1940年夏调中医杜伯华任卫生部副部

长兼制药厂厂长。聂荣臻在关于杜伯华的工作安排上特别指出要充分发挥杜伯华中医中药知识丰富,能够自制和研究中药的特长,把制药厂办好。杜伯华在任职期间,根据聂司令员的要求,在中药生产上做出了显著贡献。聂司令员签发的《关于自制代用品问题的训令》中强调:“按中医药方所配成”的药品,“屡经试用均极有效”,要部队推广这个厂的经验。1941年7月杜伯华病故,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军区批准制药厂改名“伯华制药厂”,并于安国、阜平开办新华药店。该厂生产的疟疾丸、痢疾丸、黄连膏、行军丹、避瘟散、灭疥灵等共有119个品种,在冀中防治疟疾等传染病的流行和军民保健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如唐县创办的制药厂,也以自制中成药而著名。有同志回忆说,当时内科用药有三分之二依靠自制的中药丸、片等。冀中军区制药厂曾八次改名,六次迁址,但自采中药、加工制造中成药的任务从未改变,所生产的丸、散、膏、丹、酞、片,如扑疟母灵、歼疟灵、痢必停、行军丹、十滴水、避瘟散、灭疥膏、人参片、参苓补丸等百余种,四万多公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其他还有晋绥军区和120师所自办的中药厂,也很好发挥了中医中药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7. 晋冀鲁豫军区的中医工作

1947年7月,中央军委命令刘邓大军、陈谢大军挺进大别山,为了适应部队轻装的要求,鲁之俊同志运用他从任作田老中医学习来的针灸疗法,首先训练纵队医生掌握针灸治疗常见病知识,然后层层负责培训旅、团、连的医务主任、卫生队长和卫生员,从而使针灸治疗一般常见病的技 术很快在部队得到普及。一次,一个团过河,由于河水冰冷,使千余人腰腿疼痛不能继续行军,幸得连卫生员迅速给予针灸治疗而跟上部队。针灸治疗流行性感 冒,也为部队排忧解难作出过令人惊喜的贡献。同时,由于部队首长和卫生员都掌握了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使军民关系更为密切。解放战争中,第三、四野战军或办针灸学习班,或翻印鲁之俊编写的《针灸讲义》,使针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针灸讲义》几经翻印修改,于1950年改名为《新编针灸学》,由重庆出版社等先后正式出版。刘伯承题词:“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医学乃为必要之图,鲁部长之俊同志在延安研究针灸学,以批判的态度接受其合理部分,试用之有效,旋于中原进军时,治愈军民不少,今复编而为书,亦扩展研究之肇始也。”邓小平题词:“把我们国家许许多多的科学遗产,加以批判地接收和整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由朱劭同志主持的华北卫生实验学校,有四个班,

针灸班是其中之一。这个班除要求学员学好针灸学外,还要求他们掌握生理、解剖等现代医学知识。朱劭著《新针灸学》就是在校针灸教材的基础上编撰出版的。朱德委员长为该书题词:“中国的针灸治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在使用方面,不仅简便经济,且对一部分疾病确有效果,这就是科学,希望中西医团结改造,更进一步地提高其技术与科学原理。”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8. 东北抗联的中医中药工作

抗联开设的中药店,以鹤岗市“德泰和”影响最大,负责人是现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一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翟延龄(河南安阳人),他从小学习中医,并先后跟随名中医徐博承、黑红伤中医名家张子元学习中医内、外科。1933年接受地下党资助开办药店,并挂牌“专治黑红两伤”。这个中药店开办以来,除了胜利完成地下党联络站任务外,并为抗联提供了大量治疗外伤的中成药。又如讷河县“和庆瑞”中药店掌柜李仁峰,中医赵麟阁,以及许多佚名中医都亲自跋涉为伤病员诊治伤病。特别是富锦县的一位老中医,献出祖传治疗枪伤的秘方,为部队治疗枪伤等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方法后来被许多干部作为治伤常识所掌握和使用。自学成医的王耀钧,术通中西医,他亲自带领战士上山采集中草药穿地龙、蒲公英、马尿臊、老鸱眼、黄芩、山黄连、红花等,配制外科用药及内科用药,在发挥中医中药作用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威武不屈,在敌人绞刑架下,英勇就义。

9. 新四军组织中西医团结合作共救灾

1945年5月《拂晓报》以《武装抢救瘟疫工作纪实》为题,报道1944年夏于岔河、仁河等战胜瘟疫流行的事迹。在这次扑灭瘟疫的过程中,岔河县政府、县联救(联合救灾防疫会)与县卫生合作社,联合召集全县中西医师118人,共商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扑灭传染病的措施。其中有力措施之一是成立了有十多位中西医师参加的研究会和巡回医疗队,各区、乡、镇也多仿此进行卫生宣传、开展卫生运动、到基层防治传染病等。与此同时,新四军还派出卫生防疫干部,县委还派遣三个连的兵力保护防疫队,以及有中西医参加的35人抢救队,深入游击区、敌伪据点附近进行防治工作,使回归热等传染病得到迅速控制。发病率由1944年的30%下降到1945年的2%,群众献诗歌颂:气属三春瘟疫流,沿村传染令人愁。四师特派四名士,百姓咸歌百病疗。只说华佗难再世,谁知岐伯竟重游。灵丹多活苏民命,一纸声扬颂万秋。

闽东游击队、东江游击纵队等,也都十分重视功

员吸收中医参加部队医疗卫生工作，日本占领香港，广东党组织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从香港抢救出文化界民主人士八百余人，护送至安全处所。当时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生病，正是东江纵队的中西医师为他们煎药送汤，很快恢复了健康。纵队领导要求医务人员都要访问民间医生，向中医学习中医中药和单验方治病的技术，使根据地防治创伤和传染病的工作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三、制定中医政策的宝贵经验

综上所述，尽管以上情况并非全貌，也不是系统的反映，但却给予我们一个清楚而肯定的认识，中医中药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各级领导人的重视，在保证伤病员康复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

实践出真知，中医中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以卓有成效的经验，易为学习掌握的特点，遍地皆有药物

可以采集的优势，雄辩地告诉人们，中医中药是科学，绝非国民党政府所视之为卫生的障碍。在这二十多年广泛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各级卫生行政领导亲身经历，使许多原来并不甚相信中医科学性的同志，对中医中药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概念，这就为促成正确对待中医学术和中医方面，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估价。所有这些，为建国后所面临的更大的中医药学问题的解决，即如何正确对待有数十万大军的中医，如何正确对待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学宝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是由于这些，才会有建国后“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遗产”中医政策的制定，也正因此，贯彻中医政策才有了干部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是符合科学的发展规律的。符合规律的事物是一定能够胜利的。中医中药事业在近三十多年的继续努力下，已经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她必将取得更加重大的胜利。

· 中医工作动态 ·

• 天津第一医院肝病研究所用中医辨证论治治疗慢性肝炎获成果。经356例验证，治愈率达72%。

•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故乡——浙江省义乌县，新近建成县中医院门诊大楼，已正式开诊。这家中医院还将建立丹溪纪念馆和丹溪纪念铜像。

• 佳木斯市中医院实行辨证施护取得较好效果。如内科采用中药保留灌肠法协助治疗尿毒症；小儿科将小儿泻泄症分成伤食、湿热、脾虚三个症型分别选用按摩、推拿、捏积、穴位封闭等方法，取得了很好效果。各科都设有护理盘，备有针灸灸、火罐等。

• 广东省和广州市中医护理学会不久前联合举办了全省首次中医护理知识竞赛，有十九所中医院的二十一个代表队参赛，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广东省中医院代表队夺得冠军。

• 根据“闻香治病”原理特制的1400只“黄岩药枕”已经飘洋过海飞到日本朋友家中。药枕又名“辅助医疗保健枕”，内装辛荑、佩兰、甘松、藿香、防风、独活等多种药物。通过嗅觉或皮肤接触，作用于人体血脉、经络、脏腑及感觉器官，可收到解除病痛、强身延寿之功效。

•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重庆分会科普委员会不久前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三年规划”，拟在年内举办一、二期“中医老年保健”讲座。

• 全国中医急性胃痛科研协作会议不久前在厦门市召开。会议讨论交流了中医对阴虚、血瘀、温热型的急性胃痛的临床观察以及中药胃止痛灵、胃止痛膏的临床验证，还讨论了编

写《中医治疗急性胃痛》专著等事宜。

• 截至目前，山西省26年来已举办了十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培养出学员508人，推动了全省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 广东省部分中药界专家最近举行座谈，呼吁成立全国性中药学术专门机构——中药学会。他们认为学会可下设中药商品、中药制剂、中药炮制、中药鉴定、临床中药、中药栽培等分科学组。

• 今年初在长春发现的古医籍《梁氏集验良方》，最近据专家鉴定，系曹雪芹祖父所收藏，曹雪芹多次翻阅。《曹雪芹》的作者、老作家、红学家端木蕻良认为，《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用药合璧的药方可证明曹雪芹看过此书。

• 《中医皮肤科诊断学》最近在武汉出版。全书约三百万字，对二百多种常见皮肤病和部分疑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鉴别诊断等都有详细论述，书末附有中西疾病名对照、皮肤科用药特点及选方。

• 著名医史专家、福建中医学院俞慎初教授最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几十年的宿愿。

• 杭州胡庆余堂将建成我国中医药旅游中心。这个中心将有胡庆余堂古建筑、中药博物馆、康复保健中心，并开展药膳、按摩、气功、针灸等业务。还将建成中药植物园、中药贸易中心等。

•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外科分会肿瘤专题学组于1986年6月6~10日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举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代表们讨论了中医治疗肿瘤的诊断、疗效标准等问题。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及部分省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